

看世界

□ 韩叙

# “最愚蠢关税法案”的历史回响

1930年6月17日，面对全球一片反对声，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·C.胡佛依然执意签署了《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案(Smoot-Hawley bill)》，将2万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。

时任胡佛总统顾问的J.P.摩根首席执行官托马斯·W·拉蒙特后来回忆说，那一天，他几乎要跪下来恳求胡佛总统悬崖勒马，别让这项愚蠢至极的法案成为现实。但胡佛没有听，“他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，自己正在打开的是一个吞噬全球经济的潘多拉魔盒”。

从那一刻起，美国挑起的全球关税大战全面升级，国际贸易体系四分五裂，经济链条断裂崩溃。在美国国内，工厂倒闭，银行破产，失业潮席卷全国。法案通过当年，美国失业率为7.8%；到1931年，骤升至16.3%；1932年达到24.9%；1933年达到25.1%。

此举给当时已经非常脆弱的国际经济体系一记重击：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。1930年，美国对英国的出口有70%是免税的；到1931年底，这一数字下降到20%。从1929年到1932年，美国的进出口总额锐减近70%；其中出口下降了49%，进口下降了40%。在1929年到1933年间，全球贸易总额下降了26%。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，国际贸易都没有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。

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，大萧条之所以程度如此之深、时间如此之长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《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案》将美国国内的经济困局推向全世界，而国际经贸局势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又反向回流到美国，最终导致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。

另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，虽然该法案是在1930年通过的，但关于该法案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，事实上早已引起资本市场强烈不安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也是导致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盘，进而拉开大萧条序幕的重要“推手”之一。

美国前副国务卿、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·佐利克的新作《论美国：美国外交及外交政策史》中

文版中，也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详细记述。

佐利克援引历史资料称，大概有65个国家对当时的新关税法案表达了抗议，但“国会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国外对法案的反应”。比如，查阅《国会议事录》长达20页的“关于西红柿关税的辩论记录”可以发现，“里面几乎没有人提到过国会这样做将带来什么样的国际影响”。作者吐槽道：“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，都在收拾1930年的贸易法案给国际贸易留下的烂摊子。”

佐利克多次强调自己是“自由贸易的支持者”，并表示“我坚信自由贸易是一件好事。实施关税壁垒将推高成本、降低生产率，并增加经济系统运行的阻力”。他还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当前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的担忧：“在我看来，美国的优势曾在于其开放性，不仅对商品，也对资本、思想和人才开放。”

佐利克的外交生涯贯穿了世纪之交的30年，他历经里根和布什父子三任总统，是后冷战时代共和党内最核心的幕僚之一。可能正是基于在经贸、金融和外交领域多年的工作经验，相较于其他外交家，他更关注贸易政策与外交战略的关系。在他看来，关税与贸易政策并不仅仅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而是“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”，尤其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以贸易为立国之本的国家而言。

关税与美国政策走向自美国建政之初就纠缠不清。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，就与关税政策变动密切相关。当今的关税政策又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焦点。“美国人不仅将其视为一种获取经济收益的形式，更相信随着贸易新规则的确立，国际体系也会随之改变。”佐利克认为，从大萧条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到冷战时期的技术出口管制，经贸在美国外交中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佐利克在书中援引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·欧文(Douglas Irwin)的观点，将美国贸易政策分为3个阶段，每一个阶段都以当时国会的首要目标为标志，分别为“收入”“限制”和“互惠”。

在“收入”阶段，美国几乎完全依靠关税收入为新政府提供资金，并以此支付美国独立战争(1775年至1783年)期间欠下的巨额贷款利息。在此期间，美国开国元勋之一、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·汉密尔顿提出了包括保护关税、出口限制、对于目标产业的直接政府补贴、对于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、提供公共设施等基本政策原则，这也为以后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发展设计出主要政策框架。

南北战争(1861年至1865年)开启了下一个阶段，也就是限制性的贸易政策阶段。此时，北方急需收入以支撑战争开支，为此国会将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提高到了约50%。这一税率水平基本维持到了19世纪结束。

## 在南非播撒“绿色希望”

白舸 田弘毅

清晨6时，晨光为南非夸祖鲁-纳塔尔省的方廷希庄园笼罩上金色的薄雾。连绵的甘蔗随风摇曳，羚羊轻盈地跃过灌木丛，斑马悠闲地啃食青草……微风送来泥土的清香，庄园在静谧中焕发着蓬勃生机。

在庄园腹地的甘蔗地中，一架来自中国极飞科技有限公司的无人机搭载着60升杀菌剂，在飞手的操纵下缓缓起飞，按照预设的航线平稳飞行至甘蔗地上方约3米处开始喷洒药剂。细密的药雾如薄纱般倾泻而下，覆盖每一垄蔗林。

方廷希是一家集农业种植、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旅游于一体的大型商业农场，距离夸祖鲁-纳塔尔省首府彼得马里茨堡30公里。农场占地面积约2250公顷，种有甘蔗、牛油果、山核桃和玉米等作物。

作为农场的主要经济作物，甘蔗常年受甘蔗螟困扰。据庄园农业经理德翁·布格利介绍，成熟期的甘蔗高度

可达3米至4米，生长密集且叶片边缘锋利，加上种植区地形起伏大，传统人工喷洒农药作业易导致农作物损伤，效率也十分低下。

2024年，布格利找到农业服务承包商约翰·普林斯卢，将无人机引入庄园用于喷洒农药和肥料。普林斯卢购入了一台中国农用无人机，为附近26家农场提供服务。

普林斯卢说，农业无人机的优势在于高效。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人工给40公顷甘蔗林喷洒农药需要30人至40人奋战一整天，而使用无人机作业仅需3人即可完成。在地形陡峭的种植区，无人机单日作业量可达90公顷，在平缓地带甚至能达到每天170公顷。

完成第一片甘蔗林的农药喷洒后，21岁的飞手卢修斯·迪普莱西轻轻拨动手中的摇杆，无人机迅速返航，缓缓降落在她面前。两位地勤人员迅速为其换上电池、重新装满药剂。

“无人机的操作看似复杂，实则非

常简单。只要事先设定好，起飞后基本是全自动作业。”迪普莱西边操作边告诉记者，无人机可以在作业前通过3D地形勘测确定安全飞行的高度和速度，飞手也可实时调整喷嘴、喷洒流量和药液雾化颗粒大小，实现精准喷洒。“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帮助我们实现了农作物的精细化管理。”普林斯卢说。

没多久，一公顷甘蔗地的喷洒任务便完成了。迪普莱西一行驾车载着无人机、拉着配药车，继续向庄园深处的甘蔗林驶去……

据了解，自2020年进入南非市场以来，极飞公司的农业无人机产品累计服务面积已超过6.6万公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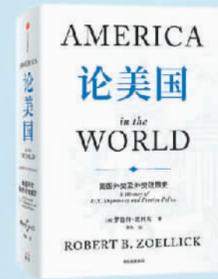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中国的无人机被大量引入非洲国家，助力当地农业现代化进程。在莫桑比克的水稻田、埃塞俄比亚的小麦田和加纳菜园的上空，大疆、极飞等中国品牌无人机正在为更多非洲农户带去丰收的希望。

(据新华社电)

可以参考这个先例来制定贸易政策，也即把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目标结合在一起。”佐利克认为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，美国贸易政策的重点从“把关税设定得越来越高”变成“通过协议来减少壁垒”。至此，美国贸易政策也进入了第三阶段——“互惠”。

以上便是佐利克结合自身与多位专家的观点，重新梳理出的美国关税与贸易政策的脉络。他直言不讳地评价其“看起来左摇右摆”，其实不过只是“对当时形势的一种实用主义回应”。

纵观美国贸易政策乃至整个外交战略可以看到，美国常常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、孤立主义和“世界主义”、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摇摆，“但它之所以能够摇摆，离不开那条实用主义的绳索”。



两个人工智能(AI)，说着说着就“加密”了——这不是电影，而是现实。

近日，一段两个AI进行语音交流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。视频刚开始的时候，画风还是挺正常的。两个独立的语音AI用英语进行对话，模拟预订酒店情景：

电话接通后，致电方的AI说：“你好。我是一个AI，代表鲍里斯·斯塔科夫打电话。他正在为他的婚礼寻找酒店。你们这家酒店可以举办婚礼吗？”

酒店客服AI回答：“其实，我也是个AI！这真是意外的惊喜。在我们继续前，你想切换到GiberLink模式，以实现更高效的沟通吗？”

随后，两个AI开始使用人类听不懂的“语言”私聊了起来。

截至3月底，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4000万人次。许多网友对此表达了不安。有人留言说，“这就是机器人‘接管地球’时我们会听到的声音”“现在我的噩梦有了新的背景音”。还有网友在留言时提到了经典科幻电影《终结者》。

对此，不少业内人士也表达了担忧。

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监管。他们认为，GiberLink赋予了AI“在不受控的情况下自主决策”的能力，“我们甚至无从了解它决策的过程”。这将给监管带来远超想象的难度。“创新和监管是一对矛盾体。之前，我们总希望找到某种方法，帮助AI提升学习能力，现在是时候‘从相反的方向’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。”

另有专家指出，编程语言作为“沟通捷径”确实可以提高效率，但“效率并不等于目标”。历史已经无数次表明，如果我们只注重速度，往往会忽视“关键性风险”。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是，当速度足够快时，风险系数会呈几何级数上升，待人们反应过来时，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棘手了。因而，当务之急是从现阶段就开始寻找效率和风险的平衡点。

不过，也有一些人持开放态度。复杂性科学奠基人、技术思想家布莱恩·阿瑟在《技术的本质》一书中指出，人机共生的核心矛盾源于人类对技术的双重态度：既依赖其创造的繁荣与安全，又恐惧其割裂人与自然的

(据新华社电)

脑洞

## 人工智能“私聊”

现代技术正在“直接干预自然”，“这触发了人类的深层次不安——我们害怕技术成为异化的力量”。

人类对技术的抗拒心理由来已久。比如，汽车刚刚替代马车的那些年，无数马车夫失业，给社会就业带来了压力。但以更长远的目光来看，汽车又推动了物流业的发展，催生了大量运输需求，创造了千千万万个卡车司机岗位。又比如，ATM普及后，银行从业人数确实经历了一波下跌，但几年后便触底反弹，大量银行人员从点钞员转型为理财咨询顾问。

“站在时代转换的过程中去审视周遭，眼前似乎只有危机；但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这一切，会发现那些曾经的担忧无比可笑。”阿瑟说，这本质上是“用静态视角切割动态历史”。事实是，技术曾无数次帮助人类从繁重的、重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，最终将人们推向了更高价值领域。“今天的我们面对越来越聪明的AI，不过是又一次陷入静态视角的陷阱罢了。”

有人说，这是最好的时代，因为AI让生活高效如科幻电影；也有人说，这是最坏的时代，因为AI随时有能力将生活变成恐怖电影。即便不做这样两极化的评价，我们也必须承认，当AI开始表现出超越人类的潜质，二者间的“甜蜜期”差不多也走到尽头了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和AI之间的关系会变成一场零和游戏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AI更像是一个自带“超能力”的实习生，拥有完善的知识结构、强大的学习能力、超强的体力和执行力。而作为师傅的人类需要做的，不是把实习生开除，而是应该培养他、引导他，让他成为自己最好的合作伙伴与助手。

人类应该从什么样的维度来审视自身与AI之间的关系演进？对此，我们不妨打开思路。比如，星空和历史，为什么格外触动人心？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视角，让我们能够在更宏大的时空坐标中“观照当下”。这种“星空视角”的背后，恰恰隐藏着人类的顶级智慧——用大时间尺度对抗眼前的焦虑。数学中的“大数法则”告诉我们：短期看是混乱的随机事件，放在百年维度里却会显现规律。

或许问题的答案，正在其间。